

26408 21
剑河

文史

资料

JIANHEWENSHIZILIAO



第一辑

政协剑河县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剑河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剑河县委员会
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六月

政协剑河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杨胜溢（兼）

副主任委员 陈远卓

委 员

李锦章 杨昌润 杨政维 刘光德

吴本洲 吴 正 张岳奇

前 言

《剑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今天同大家见面了。这是政协剑河县委员会献给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份礼物。我们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全县一十六万五千多人口中，少数民族占83%。因此，在这一辑文史资料选集里，我们着重选登各有关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生活和斗争事迹的稿件。

我们要建设剑河、必须首先了解剑河，了解它的民情风俗，了解它的自然山川，而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历史。

剑河的各族人民，历来是勤劳勇敢而富于创造性的。先民们以辛勤的劳动，在荒凉的崇山峻岭开劈了层层梯田，培育了优质林木，建起了星罗棋布的村落。在清雍正前的剑河，各民族相依相存，自耕自食，自织自穿，从没想到要去侵扰别人，也没想到要防御别人的侵扰，过着朴实而宁静的生活。但是，从雍正以后，朝廷派大军连年征战，为征服和奴役剑河的各族人民，他们在这里安设屯堡，派驻屯军官吏，实行最残酷的压榨和最黑暗的统治。为了争生存，争自由，从雍正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前后二百二十多年时间，剑河的各族人民从没有间断过反抗和斗争。历史上有名的雍、乾、咸、同苗民大起义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几次重大的民族抗暴政斗争都发生在这里。同时，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儿女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是剑河人民的光

荣。这些光荣的历史业迹，在这一辑文史资料选辑里均有所反映。

在编选这个选辑的过程中，得到县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重视，得到县志办、党史办的大力支持，许多政协委员和知情人士热情为我们撰写文章，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人手少，水平低，历史知识有限。在这个文史资料选辑里，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

目 录

前 言

- 剑河历史概况……………张岳奇 陈远卓 (1)
- 剑河屯堡之安设及其消亡(再稿)……………张岳奇 (25)
- 剑河辛亥革命纪实……………张岳奇 (47)
- 民国时期剑河县历任县长简介……………陈远卓 (52)
- 李世荣将军生平……………陈远卓 (72)
- 回忆李世荣将军……………张岳奇 (93)
- 李世荣诗词选…………… (102)
- 王天培将军蒙难前后…………… 文中汉 (112)
- 我参加北伐的经过…………… 江绍林 (116)
- 天锦剑黎的抗日救国军…………… 陈贡章遗稿 (130)
- 黔东南苗族大暴动前奏…………… 张岳奇 (137)
- 南明地区侗族人民的抗暴政斗争…………… 陈远卓 (142)
- 南明暴动事件参与者的回忆…………… 杨再清 杨再根 (155)
- 刘光前被害经过…………… 刘光德 (162)
- 黔东事变亲历记…………… 王国基口述 吴正整理 (168)
- 民国时期剑河的天灾匪祸…………… 刘光德 (174)
- 剑河教育史略…………… 杨胜溢 (180)
- 阮略杀害闵世俊夫妇的前前后后…………… 杨胜溢 (190)

阮略其人其事.....	罗伯鼎 (196)
杠子岭.....	刘光德 (198)
小广侗家的婚姻习俗.....	陈远卓 (205)

剑河历史概况

张岳奇讲述 陈远卓记录整理

一、剑河苗、侗族的来源及其发展

剑河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说到剑河的历史，苗、侗两个民族应占重要地位，至于汉人，那是清雍正以后，城里面和屯堡才有汉人居住，在此以前，剑属清水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苗族聚居区。南明、盘溪一带属于侗族聚居区。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两个民族的来源及其发展。

对侗族的来源，我没很仔细的研究过，有人主张来自广西“骆越，”他们的根据是民歌，我认为单纯以民歌确定族源，未免有些牵强。以我的见解看，还是来源于“三苗。”三苗原在左洞庭，右彭蠡，即从洞庭湖沿长江下，武昌、江西九江等地都属于三苗之区域。淮南子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上也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这说明挨近广西的这一大片区域，土著民族就是“三苗”。

从历史和地域上看，侗族实际上也是从江西迁来的。我查过王天培的家谱，他们祖先来源于江西。南明、盘溪一带好多侗族同志都说自己的祖先从江西迁来。这是符合西迁这个说法的。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侗族也是来源于“三苗，”“三”字不能当一二三解释，《汪中续学篇》里讲“三”是多数

的意思，郭沫若也说过：古人用字，“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举凡“三才”、“三光”、“三宝”等等。很多事实说明，“三”是众的意思。因为当时，左洞庭、右彭蠡，苗族居多，其他如瑶族、水族、侗族等等。当时是不能区别得很清楚的，于是用“三苗”即众苗的意思，直到满清，侗族还说是苗。满清的文献没有举出侗族，比如说乾隆的谕旨上都是说苗，侗族也说成是苗。《清江志》上划分很多寨子，哪个寨子归哪个土千总管辖，哪些寨数是汉寨，哪些寨数是苗寨。讲苗寨还可以，讲汉寨完全是错的。因为在当时除了苗寨便是侗寨，根本还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汉寨。南明设治较早，元朝就有个南木洞长官司。明洪武五年，辰州卫长官刘宣武来招降十三洞（即黎平管辖的十三洞），那时候就设了赤溪浦洞长官司，以土酋吴世懿任长官。到永乐七年，又由军队里派来杨通谅任正长官。从那时起，便有了一个正长官，一个副长官，都是世袭长官。朝廷以这两个长官统治这个地方。一直到清朝，张广泗来镇压苗族的时候，两长官带土兵来助战以后，才改设土千总（长官改成土千总）管理这个地方。赤溪浦洞也属过思南的田家，后来又隶属湖南新化，以后又改归黎平。清乾隆三年才拨过来，才把赤溪浦洞拨归清江厅，以前剑河不上粮，只有南明有粮，有几十两银子的粮。侗族情况大致是这样。我对侗族没有研究，谈不出更多的情况。

至于苗族，我对剑河苗族的历史研究较多些，也写过几篇文章。我在写《雍正前剑河苗族社会考》这篇文章时，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苗族的来源。有关苗族的来源，满清时梁启超同章太炎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争出个结果。解放

后，全国民族会议，西南民族会议及贵州省民族学会召集过几次会议讨论，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统一认识。

我写雍正前苗族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苗族族源的问题，而苗族的来源又是这样复杂，争论的焦点是“三苗”。在《尚书》里讲有“三苗之国，三苗之君，三苗之王。”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地理上看，苗族来源于“三苗”，因为左洞庭，右彭蠡，苗族迁徙上来是有据可考的。但如果依《尚书》之说，就产生了一个疑点，苗族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国，有了君，有了王，为什么到后来反转没有了呢？这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从一般的历史看，在少数民族史上，苗族从一世纪到三世纪尚处于原始社会，到宋都还有图腾信仰，《尚书》所指的年代是在纪元前若干年，这不合进化发展原则，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一九八〇年在贵阳召开的民族史讨论会上还争论。我运用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学说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到夏才进入奴隶社会，国家是在奴隶社会阶段才产生的，夏以前还是部落社会，怎么会搞出国，搞出君，搞出王来呢？这中间我批判了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把所有书上的东西都看成圣经，不敢触动。我用恩格斯“国家是一个级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原理，否定了上述“三苗之国，三苗之君，三苗之王”的说法。那时不可能有国有君有王。文章写好后，我将其送到贵州民族研究所，民研所的同志看了标题便对我说：“算嘞，张老先生，搞这东西要有条件，要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是让那些专家学者搞去吧。”听他们这一说，我只好撂起啦，后来我又把它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审查，中央民院，在我们国家总算个高等民族研究学府，他们看后作了评

价，指出：作者提出大量资料，认为“三苗”是左洞庭，右彭蠡的土著民族，论据也比较充分。这篇文章又转到贵州民研所，结果还是没有发表。到了一九八一年冬天，《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在贵阳召开，全国苗族的知识界人士大都集中到那里来，这才肯定了“三苗”是苗族的先民，我的这篇文章到此才获得发表。文章论证了三苗是苗族的祖先，三苗是左洞庭，右彭蠡的土著民族。

到禹伐三苗，这时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禹来征伐三苗，我搜集的那些资料说明，最初进入奴隶社会，杀人是很惨的，他们不留奴隶，不过左洞庭，右彭蠡地域很宽广，禹的人又不很多，他当然就杀不绝。三苗这才被迫西迁，从洞庭湖迁入沅江。这时楚国的楚人已经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剡木为舟”，就是把大木头刨空了当成舟船，这个情形，要渡过洞庭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有湘江、资江阻隔，三苗与中原地带脱离接触，从此，文献上找不到三苗的记载了。到了东汉，光武帝由长安迁都洛阳，这时正是所谓的“光武中兴”时期，他想征服西南的少数民族，四次派兵伐五陵五溪蛮。这样，三苗又被逼着从沅江再度西迁。有一支由潯阳江上，有一支由清水江上，同时进入黔东南。这就构成了现在的黔东南的苗族。这只是个大概。我们研究历史，要有根据，要依据历史文献去考证，写史要写信史，没有根据，乱说一通，遗害后人。

二、剑河第一次苗民大起义

从东汉时期起，苗族便在黔东南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里山高谷深，浪急滩险，清水江中下游是不能徒涉的。因

此与外界隔绝，同时又由于苗族对历朝的统治者并不侵犯，这就形成了苗族社会结构的特殊形式。以“鼓社”为例，一个鼓社就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军事组织。在台拱，九个鼓社结成方里一个部落。在剑河则是寨自治，比如说公鹅寨，还另有几个子寨，这就是一个组织。他的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以三根支柱组成，这就是“议榔、牯脏头、理老。”苗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没有产生过全民族公认的领袖人物，没有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扩张，他们自耕自食，自织自穿，从不侵犯其他民族。所以，在清以前，虽经晋、魏、南北朝和唐、宋、元、明若干朝代，中央很少对黔东南苗族用兵。只是在明朝中叶，朝廷曾派兵打过香炉山，在凯里设过土司，八寨么坝长官司，其余剑河则称“化外生苗。”台拱称“九鼓生苗。”“生苗”作何解释呢？《镇远府志》上这样讲：有土司管辖者为熟苗，无土司管辖者为生苗。这就是说，剑河、台拱、雷山等几个地方的苗族，在清雍正以前，不仅无汉官管辖，连土司也没有管辖过。在那一段历史上，苗族社会比较安定。生产也较发展。苗家山寨筑造的层层梯田，就是苗族先民们在那一阶段开垦的。雍正以后没有开田，这随处都可以找得出证据。比如柳堡的屯田，他们现在去挖荒田，那田中的树木都有一抱多粗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雍正以后，不特没有开田，而且荒田，证据随处都可以找到。

《清江志》上有过记载，大意说在雍正前，这片土地不仅没有汉官管辖，连土司也没有设过。到了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满州鄂尔泰看到周围三千里苗疆没有归向管辖，就想把这块地方收归统治。这件事，雍正后来承认办错了，乾隆也承认办错了。鄂尔泰也不得不承认办错了。自请皇上削去他一

等伯和大学士爵位。张广泗把这个地方血腥镇压下去后，也不得上本请罪。这是《清实录》上讲的。这是个什么道理呢？当时鄂尔泰对雍正说：只是清理一下这个地方，登记户口，谁知后来并不是这么回事。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鄂尔泰派副将张禹模带两千多兵，深入苗地驻柳罗塘。他们先在清江北岸各寨清理，利用一些汉人作通事，动员苗民归顺。清水江北岸有些寨子在军威胁迫下，勉强归顺了，南岸的寨子以公俄为首的各寨不同意归顺。当时公俄寨的力量比较强大，还连络了别的一些寨子，经常利用夜晚到清兵营里去摸夜螺蛳（偷袭）。清兵感到骑虎难下，于是便下令将贵州全省的兵力调集镇远，由张广泗指挥。张广泗率领兵力进驻剑河上渡河柳受一带。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公俄寨连络了摆尾、白索、白汉等苗寨，订立联盟共守江防，清军无法过江。张广泗当时用计，声称只要把北岸的户口清理一下就撤兵。南岸的首领们听说要撤兵了，便疏于江防，对船隻的管理也不那么严了。这就给清军造成了可乘之机。

雍正七年（一七二八）古历五月十四日，镇远知府方显探明这个情形，确信苗兵已放松警惕，就在当天晚上，在柳受附近集中了四十多只木船，加上南岸放过去的十多只，共集中了五十多只木船，连夜渡江，将所有清兵全部渡过南岸。派游击姆椿龄带八百兵上山关口，堵截外来的援兵，然后攻公俄寨之左。守备徐春达带五百兵攻公俄寨之右，张广泗亲自督率精兵攻中路。全省兵力不下五六千人，公俄只一小寨，失败是在所难免的。站在苗族人民的立场上来写历史，打败仗是不好写的。我在文章中写的是：“公俄以一寨

之力，抗全省之兵，众寡之势，既不相如，武器精良，又相悬绝，然尤奋起抵抗，杀敌甚夥，终因清兵炮火密集，势难久支，才掩护家属，转移后方”。所以，仅公俄失守，打了败仗，并非一败涂地。

占领公俄寨的当天，张广泗算定，苗以夜袭为奇计（摸夜螺蛳认为奇妙的计策），他于是把兵散伏四面，将寨子空起来等待。果然，公俄寨不甘心丢掉寨子，夜晚全体出动来摸夜螺蛳，谁知摸进去是一个空寨子，四面的炮火一打，他们背不住，又不得不退出来。《清江志》上写：“公俄寨失守，苗兵堕岩者不知其数。”其实公俄寨附近并没有什么高岩，只是被清兵杀戮了不少人。他们打下公俄以后，接着就打鸡摆尾，当时鄂尔泰的手令是这样写的：“公俄逼处清水江，宜首先剿灭。”“剿灭”这个字眼，从公文上讲，就是可以见人杀光。从五月十五日占领公俄寨那天起，确实杀了不少人。当时有个汉人叫曾文登，湖南人，他因做生意来到苗寨，与苗寨结下深厚情谊，见到清兵这样残杀苗民，于心实在不忍，便自缚赴清营，承认夜袭清兵，攻打清营等等都是他出的主意，要杀杀他一个，不要乱杀无辜。张广泗杀了他，又利用一些汉人作通事，动员苗民归顺。当时有个王家土司叫王开甲，他就说服了南哨、昂因、昂宿等苗寨归顺。清江北岸的者磨、巫包、雅磨等苗寨都投降了，南岸的中都、南脚、摆尾、久仰等都归顺了，没人再反抗了。这样，到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就设治。张广泗有云：“清水江到此陡折而南，萦回盘旋，故名清江。”清江之名就是这样来的。于是就在这里设清江厅，厅等于县。“厅”原是代表官府的衙门，他用这个厅的意思，就是将官府的衙门设在这

里，清江厅厅主当时叫同知，是天柱调来这里任同知的，除同知而外，还有县丞，通判等官名。清江厅下设柳霁分县，县丞也是由天柱调来的。

到了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张广泗又打下了台拱，将这里的同知移到台拱，又将镇远通判移作清江通判，台拱同知。在《黔南史略》上就这样写。设治以后，清廷以为这个地方被征服了，论功行赏，鄂尔泰封一等伯，授大学士；张广泗提升为两湖总督，都升了官。可是好景不长，这里的苗民并没有心悦诚服。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过去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寨自为治，人家打这个寨子时，其他的寨子袖手旁观。结果被人家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收拾，大家都吃了亏。认识到这点，于是大家串连起来，情形就变了。

到了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包利、红银在鸡摆尾起事。包利是古州色同高表人，原是个侗族，那时他称苗王，榕江现在还有苗王庙，就是为纪念包利而立的。《古州志》上也有“苗王老包”之说。包利原在那边造反，称苗王，当地长官奏折到朝廷，清廷派兵来剿，在那边站不住脚了，才跑到这边来串连，后在鸡摆尾起事。红银是当地人，还有一个老伦，他们三个联合在一起，集中了好几千，想围攻清江城。当时的贵州提督哈元生得到塘报，就亲自带兵来攻打他们，来到巫交沟，遇到包利、红银的义军阻击，这时台拱、凯里的义军都起来了，便将他逼上莲花屯（莲花屯在台江剑河两县的交界处，距巫交沟不远）。凯里被义军收复后，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这时哈元生在莲花屯守不住了，冲下来想逃跑，途中千总被打死，军械物资丢失大半。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不单是黔东南和剑河，整个贵州都动起来了。

雍正闻报，知道这件事情办错了，想丢手不管。在后来乾隆谕旨上引用当时雍正的话说，利其土地，它本就在我版图之中，利其人民，他从来就未归王化，利其田赋，他那里本来就没田赋，如果在那里设兵设官，从他那里收来的还抵不到付出的万分之一，我们为什么要去搞这个事情呀？所以雍正就想放弃不搞。可是他已处于骑虎之势，欲擒不得，欲放不能。整个贵州的苗族都动起来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才又派刑部尚书张兆来收拾。张兆体察雍正的心意，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想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所以迟迟不动。雍正死，乾隆即位，尚未改元，还沿用雍正的年号。这时他为了顾全皇考（雍正）的面子，更不能放弃，这才又将两湖总督调来。

张广泗来到贵州时，正逢哈元生打了败仗，这个哈元生原称扬威将军，董芳是他的副将军，只一仗便被苗民义军打得丢盔弃甲，清庭派张兆来此也没有办法。这时雍正刚死不久，乾隆即位，称“雍正丙辰”（一七三六年），张广泗来时，调来五省兵力，计有湖北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奇，云南承北镇总兵刘永贵，副将董芳等等。五路大军加上贵州原有兵力，共约三万余众，统由张广泗节制指挥。他派副将军董芳驻六甫塘，副将柳定国由八弓抄小路进攻巫包，巫包被攻下之后，便解了柳罗之围。接着，柳定国乘雾进攻，搞掉了柳罗大寨，董芳也乘势搞掉了六甫寨，他在六甫一个寨就杀了一百六十二人。不久，又解了清江城之围，张广泗随即进驻清江城，策划打鸡呼党（又称六马头即今久仰一带），总之，那一次杀人是很残忍的。张广泗将这里的苗民起义扑灭之后，又亲率大军进攻古州，一举将古州踏平。清水江下游也派了游击赵璧，攻克九

寨、柳寨，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踏平。这一次苗民死伤很惨，青壮年几乎被杀光，老弱者躲在箐山里头，被搜山者搜出来杀掉。没被杀的，亦被张广泗集中起来，将其流放到贵阳上边的平坝、安顺、兴仁等地去，至今那边的苗族还可以同这里的苗族对话，这当然不单指剑河、台江、雷山、凯里，其它好多地方皆如此。这件事奏报到清庭，乾隆在谕旨上说：“流放他乡者如此之多，朕心殊觉不忍。不过此乃伊等自取，卿扬国之威，那是很可取的。”这一来，被捉住的苗民大部分被遣散他乡，清水江中下游再也反抗不起来了。

接着，张广泗就在这里安屯设堡，安设土官管理苗寨。将所谓绝田划作屯田。对于安屯设堡这件事，乾隆不那么同意，旨意叫他们另想办法。不过，当时清朝政府切盼长治久安，张广泗又以身家担保，乾隆便听任张广泗安屯设堡了。

安设土官，就是把那些通事（替官府说服苗民归顺的汉人），安成土官管理苗寨，哪个说服哪个寨子就让他管理那个寨子，所谓的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土舍、通事等等，好几级官。下革东王家，他顺着太拥河说上去，一直说服到昂因、昂宿，他就管那一条河沿河两岸的三十几个寨子（这事在清江志上有记载），官封土千总。此外，也有管一寨或两三寨的。有人说清朝对黔东南的用兵是“改土归流，”言下之意是说清朝为了国家的统一，是好事，用兵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在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我的那篇文章“雍正前苗族社会考”，就是批判这种说法的。乾隆三年搞的事，到乾隆五十五年修大清一统志，它也不敢隐讳，那时欺君之罪是要砍头的，没有这些事情，造也造不出来。《清江志》上面也记载着，谁怎么立的功，谁昼伏夜行，谁说服了